



民国时期的“西藏”概念

——从 1926~1935 年间的五本《西藏问题》著作谈起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2)02-0102-13

●李 健

[摘要] 本文选择民国时期出版的五本《西藏问题》著作,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梳理五位作者对“西藏”这一概念的理解。研究发现:首先,这些著作均力图从名称上确立“西藏”与“卫藏”的对应关系,将“安多”和“康”排除在“西藏”概念之外;其次,从行政沿革上强调清雍正以后安多、东部康区归内地行省管辖的事实,借以证明“安多”与“康”已不属于西藏;再次,从传统人文地理角度将康藏分界处的丹达山,或从改土归流的角度把赵尔丰曾到达的江达作为西藏与西康的交界点。

[关键词] 民国 西藏概念 西藏境域 康藏界限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2008 年的“3·14 事件”及随后奥运火炬传递在国外遇到的风波,促成了海内外华人对西藏问题的一次空前聚焦,各种新闻报道一时铺天盖地,各种关于西藏问题以及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评论、反思、研究骤然增多,使这两个以往偏冷的问题一时升温。在中国期刊网收录的 1980~2011 年的期刊文章中,标题含“西藏问题”的共 119 篇。其中仅 2008 年以来不到 4 年的期间就有 48 篇,^①占 40.34%,年均 12 篇;1980~2007 年的 28 年间总共仅占 59.66%,年均 2.54 篇,前后差距非常悬殊。这还不包括大量不以“西藏问题”为标题但讨论西藏问题的文章以及在港台地区发表的大量相关文章。在专著方面,汪晖先生的《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2011 年出版)是近期的一部重要著作。此外,2011 年还出版了郭永虎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中的

^① 因为 2011 年的期刊文章还没有全部录入期刊网,因此实际数量应该更多。

“西藏问题”》2009年出版了张植荣的《美中关系与西藏问题——历史演变与决策分析》和卢秀璋的《美国对华战略和“西藏问题”1959~1991》。与此同时,一批关于西藏问题的博硕士论文也已完成。其他如中外媒体的相关访谈报道,数量更不可统计。由此可见近年西藏问题讨论的热烈,反映出西藏问题被学界和公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

同样,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曾有一次热烈讨论西藏问题的高潮,就是在民国期间,主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1926年至1935年的短短十年间,就有五本书名均为《西藏问题》的著作问世,^①而且其中有四本(包括再版)集中在1929年至1931年之间公开出版,这在中国的整个藏学史上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五本著作依初版时间排列,分别是:谢彬著《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26/1930/1933/1935),^②王勤培著《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1934),华企云编著《西藏问题》(大东书局,1930),秦墨晒著《西藏问题》(南京印刷公司,1931),陈健夫著《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35/1937)。2010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边疆文献辑录》^③收录了其中的三本,2011年出版的《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史地文献初编·西南边疆》^④第2辑将五本全部收录。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五本著作无疑在某些方面有些过时,即便在当时,也不一定全部堪称是代表作,其他人撰写的讨论类似主题的重要著作也还有不少,^⑤但如果回到民国的时代背景中,这些著作恰恰是当时那批精英思考西藏问题的完整记录。既然他们不约而同地都以“西藏问题”来命名自己的作品,那么至少说明“西藏问题”是他们当时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⑥

在近年国内学者关于西藏问题的论述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从不同角度深入梳理了西方人西藏观的发展演变过程。汪晖先生运用“东方主义”的工具,对西方人营造“神话西藏”的过程进行了深刻剖析,意在使西方人西藏观的本质清晰呈现出来,作为今天我们理解西藏问题的一个基础。^⑦沈卫荣先生则在回应汪先生著作的基础上,梳理了西方学者对西方的“东方主义西藏观”的自我反省、批评和清算的过程,特别是文中提及了“东方人对东方文化传统中的西藏形象的观察和研究”,指出“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式,绝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并提及了西方学者提出的“内在的东方主义”概念。^⑧但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梳理中国学者的西藏观的研究成果极少。

笔者受到了沈先生的启发。实际上,今天我们在思考西藏问题以及反思“西方人思考西藏问题的方式”时,对“我们自身思考西藏问题的方式”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顺着沈先生的思路,笔者试图选取一个历

① 此外当时尚有外交部编的《西藏问题》一书,查国家图书馆目录,还有佚名者编的《西藏问题》,不知两者是否为同一书。另外,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集)》一书的“参考书刊目录”中有“《西藏问题》,顾维钧(?)辑,民国外交部刊印”一条,该书和国家图书馆都未能确定此《西藏问题》一书的编者。

② 括号中列出了该书的初版和再版年份。

③ 中国近现代边疆文献辑录编委会.中国近现代边疆文献辑录[C].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2010.

④ 本书编委会.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史地文献初编·西南边疆(第2辑)[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⑤ 如白眉初著《西藏始末纪要》(1930),尹扶一著《西藏纪要》(1930)等。

⑥ 清末民国时期,有一批内地的官员、学者、旅行家、僧人赴藏,他们根据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撰写了为数不少的纪实、游记和学术调查性的著作,但很少给自己的作品冠名“西藏问题”。本文涉及的五位作者都给自己的作品冠名“西藏问题”,但他们几乎都没有亲身去过西藏(秦墨晒提到在西藏短暂游历过)。

⑦ 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⑧ 沈卫荣.也谈东方主义与“西藏问题”[J].天涯,2010(4).

在汉语、英语和藏语语境及各自相应的文化传统中,对“西藏”概念的理解及“西藏”概念的演变极为复杂。笔者在此暂不作详细考证和讨论,仅就民国时期五位学者的观点展开论述。

史的截面,即从民国时期的五本同名著作出发,来考察当时的知识界对“西藏”这一概念的认识,梳理在他们的著作中“西藏”这一概念到底为何。无论何时,对“西藏”概念的界定是思考和讨论整个西藏问题的前提与基础,梳理“西藏”概念的源流对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至少直到目前,在汉语、英语和藏语语境中,对“西藏”的理解仍颇多歧义。“西藏”概念在五部著作中均有讨论,是当时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但远不是讨论的全部,五著中还有其他重要问题,如“历史上中央与西藏的关系”、“晚清川边经营”、“民国康藏纠纷与内犯问题”、“英国侵藏及西姆拉会议”、“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并对西藏经济、社会、宗教、民族、风俗等作了考察。这五本著作都是反映民国时期知识精英观点的极好文献。本文限于篇幅,暂不讨论。

二、五位作者及其著述

本文涉及的谢、王、华、秦、陈五位先生的出生年代、籍贯、受教育背景、所从事职业都各有不同。这些不同正好反映了民国时期不同社会精英在共同面对西藏问题时各自持有的观点。

谢彬^①,1887年生于湖南省衡阳县一农家。先入私塾,后入新式的清泉高等小学堂和衡州府中学堂。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从日本学成归国,参加了护国战争。次年,以财政部特派员身份,前往新疆考察,写成三十余万字的《新疆游记》,为民国以来较早介绍西北边疆地理知识的专著,孙中山为该书作序并给予高度评价。其后到上海等地工作,几年间完成多部学术著作。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告别仕途,退隐家乡潜心著述。抗战时期,一度受聘于湖南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48年去世。^②谢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1921年,当年曾在《民心周报》上发表《西藏问题》和《西藏问题之研究》两篇文章。^③其研究西藏问题的代表作就是1926年出版的《西藏交涉略史》和《西藏问题》,两书互相补充,可称为姊妹篇。^④谢彬涉及边疆研究的著作还有《云南游记》(1924)、《中国丧地史》(1925)、《蒙古问题》(1926)等,其他非边疆研究的著述甚多。

王勤墉,1902年生于浙江慈溪慈城镇黄山村,字鞠侯,常以字行世,著名地理学家。少时就读于新式小学、中学,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师从竺可桢先生学习地学。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讲师,还曾任暨南大学教授、教务长,浙江大学分校教授及浙江省立图书馆编目组主任等职。1951年去世,去世前曾为珠穆朗玛峰的正名作出贡献。^⑤其关于中国边疆问题的著作有《西藏问题》(1929)、《蒙古问题》(1930)、《满洲问题》(1931),其他地理学方面的著述甚多。

华企云,生卒年不详,近代著名的边疆研究专家,上世纪30年代曾为戴季陶等创办的新亚细亚学会的领头人之一。^⑥主要著作有《满蒙问题》(1929)、《满洲问题》(1930)、《蒙古问题》(1930)、《西藏问题》(1930)、《云南问题》(1931)、《满洲与蒙古》(1932)、《亚洲之再生》(1932)、《中国边疆》(1932)等。马大正先生认为其《中国边疆》(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初版,1933年再版)一书,“是较全面地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第一本专著……该

① 关于谢彬,国内多部近代人物辞书的记载几乎都有错误,将此谢彬与国民党一位同名的将领混为一谈。参见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徐友春《民国人物大辞典》[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周家珍《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辞典》[Z].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② 侯夏.近代中国边疆史地学家谢彬[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4):92~96.杨昌泰.著名爱国学者谢彬的生平与贡献[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4):155.

③ 侯夏.近代中国边疆史地学家谢彬[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4):95~96.

④ 刘国武.谢彬与西藏研究述评[J].船山学刊,2010,(1):185.

⑤ 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81.谢振声.最早提出为珠穆朗玛峰正名的王鞠侯先生[J].京华宁波人,2009,(3).另参见维基百科“王鞠侯”条。

⑥ 叶罗娜.新亚细亚学会与《新亚细亚》月刊[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25.

书的撰写与出版在20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①

秦墨晒,生卒年不详,是民国时期的老报人。早年毕业于日本东斌学校。和孙剑秋创办过“世界通讯社”,曾任上海《时事新报》驻京记者。1938年8月1日,任《南京新报》社长,该报是南京地区日伪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是伪“维新政府”的机关报。^②其著述今天仅见《西藏问题》一书,由马福祥题写书名。该书前半部分简略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地理及英帝国侵略西藏、川军入藏和达赖出亡的情形,其后半部分列出了当时存世的西藏研究文献目录,其中中文文献44种,^③英文文献223种,可见其收集之完备。

陈健夫,别名陈代镔,1913年生于江西省奉新县。曾任南京《救国日报》总主笔,改造通讯社社长,南京市参议员。台港“新儒学”创立者。1947年12月在南京创立中国新社会党,是当时合法成立的第一个反对党。该党赴台后停止了活动,1988年3月1日他再次筹建该党,并任主席。1949年抵台后因反对内战,被以叛乱罪判刑十年(实际关了三年半),出狱后从事文教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曾任新儒家通讯社、出版社及学苑负责人,是仅存的原中国社会党的元老级人士。在监狱期间,融合孔子、耶稣和释迦牟尼的学说,自创了“新儒学”。^④主要著作有《西藏问题》(1935/1937)、《王阳明学说及其事功》(1946)、《新儒学典》(1987)。《西藏问题》一书是作者在之前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基础上撰写而成,被认为是“‘西藏问题’一类书中之杰作”。^⑤

除了谢氏和王氏外,目前可以查到的其他三位作者的生平资料很少。在各类人物辞典中,仅见关于谢、王的辞条,其他三位未见记载。关于这五本专著的评述极少,除谢氏的著作外,其他四本均无专文评述。王尧等人编写的《中国藏学史》一书提及了这五本著作,指出:“本时期(1912~1937)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通论性的西藏史地著作也颇为丰富。尤其是以《西藏问题》为题的著作作为多^⑥……这类著述大多大同小异,主要叙述西藏及川康藏区之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文化等基本情况。”^{⑦⑧}

由前述可知,五位作者都不是纯粹研究西藏的学者。^⑨谢氏一生既从政又著述,且著述涉及的主题和范围很广。王氏是大学的教师,本身是地理学家,边疆研究并不是主业。华氏是当时比较活跃的边疆问题研究专家,著述范围远超出西藏。秦氏是记者出身,后在汪伪政权中从事报业,并不能算作学者。陈氏曾于1935年从“蒙藏委员会蒙藏政治训练班第一期”毕业,后从事报业及党派政治,关于西藏的专著也仅此一本。因此,从职业身份看,五位作者中学者有2位,“亦政亦学”的2位,非学者1位。从族群身份看,他们应该都是内地汉族,主要是南方人。在著述首次出版时,谢氏39岁,王氏27岁,而陈氏年仅22岁。他们都应接受过新式教育甚至高等教育。五位作者的不同个人特征使其具有一定的社会代表性。

五著依篇幅可分为两类,谢、王、秦的算一类,篇幅均短小,华、陈的算一类,篇幅较前者多出一倍,论述较详。依内容分,王、陈二著都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方策,其中陈著用六章专讲“西藏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五本专著中最突出的;其余三本主要论述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间或加以评论,其中秦著内容极简,华著则颇

① 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J].历史研究,1996,(4):138.

② 关于秦墨晒生平的文献资料极少,参见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5047043.htm>.

③ 秦氏中文目录中仅见谢彬的《西藏问题》,因其收集的文献截至1929年9月,其时其他四本《西藏问题》尚未出版,故未收。另收有外交部编《西藏问题》,铅印中装本。

④ 参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2966.htm>. http://www.china.com.cn/ch-haixia/gb/society/party/2_609.htm.

⑤ 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M].北京: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54.

⑥ 作者将陈重为的《西康问题》(1930年中华书局出版)列入这一类书中,应有误。

⑦ 王尧先生等人所编的书在脚注部分对谢著、王著、华著的各章节的题目作了介绍,在正文中对陈著介绍较详,评价较高,认为秦著过于简约,略去未谈。(秦氏名“秦墨晒”,此书作“秦品晒”,有误。)

⑧ 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M].北京: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52~153.

⑨ 五位作者中,谢、王、华三位都著有《西藏问题》、《蒙古问题》,王、华二位都著有《满洲问题》,可见他们对边疆问题的关注较为全面,并不局限在某一专题领域。

李 健·民国时期的“西藏”概念 ——从 1926~1935 年间的五本《西藏问题》著作谈起

详。本文拟以谢著、陈著、王著和华著为重点,兼及秦著,从作者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时空背景来理解和评论这些著作对于“西藏”(包括康藏)的理解和界定。

这五本著作的发表时间前后延续近十年(1926~1935),在此期间西藏局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总体上,大的时代背景未变,正好是抗战前国民党统治逐渐平稳的十年。从 1935 年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再未见以西藏问题为题的通论性著作。

三、五著关于“西藏”的论述

(一)撰书的目的

在考察五位作者的“西藏”概念之前,先探究一下他们撰书的目的,因为这种目的很可能也会影响他们对“西藏”的理解。

五位作者撰书的目的虽各有侧重,但总体上看,还是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华、陈、秦三位在书中都写有自序,很清楚地阐明了著书的目的。谢、王的二著未有前言后记,但正文中所发议论很多,也可反映他们的主旨。总体上看,处在民国的时代背景下,他们著书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救亡图存,知识救国,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引起国人对西藏的关注,提高国人对西藏的认识;第三,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关于西藏的基础知识;第四,论述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剖析其实质,揭露英国的侵略野心;第五,为解决西藏问题提供思路和政策建议;第六,为“到蒙藏去”的人提供参考。

陈氏在其自序中痛言:

中国边疆自清季以来,破碎崩溃,岂无已时。西藏地处西鄙,交通不便。因过去中央当局一味因循,而无一种具体计划,致使西藏与中央关系,日行疏远。倘吾人不急起直追,其危险诚关乎整个的大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国青年可不为其民族祖先力谋所以恢复之道邪?……诚以国事日促,非我辈自起,共图大计,不足以解倒悬。著者有志于斯,因专力研究藏事,今且一年。本平日之所得,著成此书,公诸国人。其目的在启发一般国民对藏事之认识,庶国人共起图之。……西藏久与内地隔阂,其地之实际状况,学者鲜能道之。中外关于西藏之新旧纪,内容多不完备,欲一完备之藏纪,洵为难得。因是所谓“解决西藏问题者”,往往误认西藏之历史背景及时代背景,其解决途径,自难免不合乎实际。^①

陈氏的论述基本符合上述著书目的的前四条。而华氏的主要目的是使国人先认识西藏,然后到西藏去,其背后的深意仍是保卫国之疆土,因此他在序言中说:

钱氏之言其立论在国人对于蒙藏智识之缺乏,而以“到蒙藏去”考察为归宿。其言诚属确论。……顾欲在短期间内“到蒙藏去”之实现,则尤非使国人对于蒙藏有相当之认识不为功。若欲其有相当之认识,则窃以为有三点首当注意:今以西藏为例,则西藏之本身如何,一也;西藏自来对华关系如何,二也;西藏之历次对外关系如何,三也;三者知而后可以语于认识西藏矣。区区斯编,其用意即在于是。敢效野人献芹之旨,公诸国人。其勿以言而忽之,而使三危旧壤,有覆亡之危焉。斯则幸矣!^②

秦氏是五位作者中唯一在序言中提及自己到过西藏的人,其著书的目的同上述两位也很类似。他首先表现出对边疆的担忧:

不过近年以来,中国处于军阀时代,国家的力量和国民的视线,完全被移到内争方面;对于民生问题和建设的实施,完全没有顾到;对于远在边陲的西藏,更是无暇顾及。现在内地虽然渐渐统一,但是边疆形势,一天紧张一天了。^③

① 陈健夫.西藏问题·自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② 华企云.西藏问题·自序[M].上海:大东书局,1930.

③ 秦墨晒.西藏问题·弁言[M].南京:南京印刷公司铅印本,1931.

对于游历西藏、成书过程和目的,他叙述如下:

作者几年前虽然到西藏去过一次,但因为是游历的性质,所以对于西藏没有充分的研究与认识,所以正和走马看花一般,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印象与记录。后来从国内外记载藏案的书中,得到许多的材料,抄写出来,略微把我从前的印象作参考,写成这本通俗讲话,附以小图。作者的目的在于使国人知道西藏是怎样一个地方,对于西藏补救的办法应该怎么样。^①

与其他四位不同的是,秦氏对英人研究西藏的文献很熟悉,并深刻感受到了一种学术上的不对等,因此很警醒地说:

英国关于西藏处心积虑,已经几十年了,他们所出的关于西藏的书籍,小册子,共计有二百数十种多,里面记载的情形,比我国格外详细,反之,我们是西藏的主国,所出亦仅四十多种,并且多是游记风景词章一类,中间关于政治外交的记载,十分中只有一二。现在作者把我国所出各种藏务书籍和英国所出藏务书籍的目录,一个一个附在后面,因为这书是粗浅的,是预备着尚未研究藏事的人,作为一种介绍……这书出版后,倘能因之而使读者对于西藏得到精确的概念和轮廓,并进一步引起国人研究西藏问题的同情,然后按照中山先生扶助国内弱小民族的指示作去,那就是作者的真意,也就是作者无上的光荣了。^②

谢、王二氏在书中揭露和抨击了英国图谋西藏、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批评了政府的无能和举措失当,著书的主要目的是向国人介绍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分析其发展过程与实质。

综上,五位作者写作目的虽不尽相同,但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家国情怀。特别是在自序中,“国家”、“国民”、“国人”等词频繁出现,甚至提到“大中华民族”,其背后潜藏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正越来越清晰。这种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存在的崭新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们对“西藏”的理解。

(二)五位作者对“西藏”概念的论述

1. “西藏”名称的由来

对于“西藏”一词,各家在开篇均作了一番解释,详略不一,^③见解大致相同,即“西藏”这一概念是清代以后才出现的。

王著中只简略提到:

西藏初号秃发,唐宋曰吐蕃,元曰西蕃,明曰乌斯藏,至清始称西藏。^④

王氏与其他四人的不同之处是提到了“西番”这一概念。

华著则提到了“西藏”与“藏”的关系及地名与族名、自称与他称的问题,指出:

西藏之名称,源于境内之藏部,及位于全国之西而名之,简称曰藏。藏人自称则曰伯特友尔(Bod yul),伯特者,乃其部族之名称,而友尔者,国家之义也。^⑤……入清后,始名西藏,以迄于今。

其人则谓之唐古特,亦曰土伯特。今西人称西藏曰(Tibet)者,即土伯特一音之转也。^⑥

陈著对名称问题论述稍详,主要观点与谢著类似。陈著与其他人的著作不同的是指出了“西藏”一名出现的具体时间:

到清代雍正年间,西藏一名才出现,那便是乌斯藏或卫藏的简称。^⑦

① 秦墨晒.西藏问题·弁言[M].南京:南京印刷公司铅印本,1931.

② 秦墨晒.西藏问题·弁言[M].南京:南京印刷公司铅印本,1931.

③ 秦著涉及极简,略去不谈。

④ 王勤堉.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1.

⑤ 此处不确,藏语 yul(友尔)有三义:1. 地方 境域 区域 2. 家 家乡 3. 境。(西北民族学院藏文教研组编.藏汉词典[Z].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809.)“国家”之义的说法可能来自日本人寺本婉雅(见谢著第2页)。

⑥ 华企云.西藏问题[M].上海:大东书局,1930.1.

⑦ 陈健夫.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2.

陈著没有给出其说法的出处,但在注释中说:

雍正初年,清廷平定西藏,派果亲王入藏以后始有西藏一名,地偏西方,因有斯名。^①

对名称问题论述最详尽的是谢著,用了四页的篇幅,并引美国人洛克喜尔(Rockhill,现通常译作柔克义)和日本人寺本氏(即寺本婉雅)的研究^②来说明。主要观点是:第一,西藏既是种族的名称,同时也是土地的名称;第二,土伯特、图伯特、土蕃等译名都是吐蕃的转音;第三,元明所称的乌斯藏指卫,是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不代表西藏全体,如果“卫”、“藏”合称,并入后藏诸地,才能总括西藏全体;第四,现在的西藏一名起于清代以后,是乌斯藏或卫藏的略称,包括了今天西藏的全境,因为在中国西方,历史上有西番一词,故定名西藏;第五,在西藏一名刚出现时没有前藏后藏的划分。^③

上述四人关于西藏地名沿革的论述多较简略,主要参考的文献是《大清一统志》、《卫藏通志》等数种,其中谢彬还引述了美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结论。同今天学者对西藏地名的考证^④相比,上述四位的论述多有不确切的地方,但基本上符合史实,特别是反映了民国时期人们对问题的认识。

名称问题看似微小,其实背后牵扯的历史极为复杂,与政治也有牵涉。1961年周恩来总理在观看了话剧《文成公主》之后,曾向历史学家吴晗提出“吐蕃”、“多甘”、“乌斯藏”和“西藏”等名词的语源和演变问题,指示一定要弄清楚。^⑤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今天汉语语境中的“西藏”与英语中的Tibet似应来自两个不同的系统。一方面,上述民国时期的学者均认为“西藏”之名来自“卫藏”,卫藏就是乌斯藏,这种观点反映了中国藏区历史演变和行政沿革的实际,有大量文献可考,民国知识分子秉承了这一传统,成为今天中国人理解“西藏”概念的基础;另一方面,华氏提到西人称西藏为Tibet,是“土伯特”的转音,牙含章先生考证西方的Tibet来自唐朝时阿拉伯商人对西藏的称呼Tibbat,阿拉伯商人把西藏叫作Tibbat,又是从唐人对西藏的称呼“吐蕃”而来的。^⑥显然“乌斯藏”和“吐蕃”不是一个时期的概念,所指地理范围也差异很大。今天在西藏研究中经常碰到“西藏”与Tibet对译的困难,中外学者的理解差异颇大,应该跟这两个概念不同的语源有关。现在在汉语语境中,西藏与卫藏的大体对应是很自然的,而在西语中,Tibet总是倾向于与整个藏区对应,造成中西之间沟通理解上的误差。如果再引入藏语的语境,情形就更为复杂。今天藏语中与汉语“藏”对应的藏文词是Bod, Bodpa指所有藏族人,Bod Jongs专指现代行政意义上的西藏,Tsang专指后藏日喀则地区。就笔者的观察来看,今天在用藏语拉萨话的日常交流中,没有用“藏”(Tsang)代“蕃”(Bod)的情形,相反由于现代行政区划的影响,“蕃”(Bod)与“西藏”(Bod Jongs)在口语中的对应趋势越来越强了,而对其他藏区的称呼主要使用Amdo(安多)和Kham(康)的概念。牙含章先生认为,“吐蕃”一词最初就是指现在的西藏地方,后来因为吐蕃占领了青海、西康等地,就把其占领下的土地和人民都叫作“吐蕃”。^⑦可见,地名的内涵与外延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变的,不应以静止的眼光看待。国外总有人主张将“西藏”定义为整个“藏区”,就是没有从历史的角度理解“西藏”的典型表现。名称的问题与地域范围直接相关,下面再谈对西藏范围的界定和争论。

2. 西藏的范围

西藏的地域范围历来是西藏问题中的焦点,其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国内外对于西藏范围的界定仍存在很

① 陈健夫.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2.

② 参见寺本婉雅.藏语语法[M].京都:内外出版,1929.

③ 谢彬.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1~4.

④ 参见牙含章.关于“吐蕃”、“多甘”、“乌斯藏”和“西藏”的语源考证[J].民族研究,1980,(4).蔡志纯.释西藏名称[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2).蔡志纯.从藏博到西藏地名演变考释[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⑤ 参见牙含章.关于“吐蕃”、“多甘”、“乌斯藏”和“西藏”的语源考证[J].民族研究,1980,(4):3.

⑥⑦ 参见牙含章.关于“吐蕃”、“多甘”、“乌斯藏”和“西藏”的语源考证[J].民族研究,1980,(4):4.

大争议。五位作者对西藏的范围界定,从历史到民国都有涉及,且各家说法不尽相同。主要关注的焦点有:一,西藏的四界;二,西藏的组成部分;三,康藏、川藏的分界。

(1)西藏的四界

东接四川,川边,北接青海,新疆,西南两部与英属哲孟雄及不丹尼泊尔两小国接壤。(王氏)^①

北接新疆,南通印度,东南与青海川滇诸省毗连,西北与印度克什米尔为邻。(华氏)^②

东界四川,东南界云南,北接青海新疆,西南二部与英属印度缅甸毗连,其中夹着不丹尼泊尔两小国。(秦氏)^③

西藏的北部接新疆,南界印度,尼泊尔,布丹三国,东部与西康接壤,东北毗连青海,西北近克什米尔。(陈氏)^④

从上引可见,各家对西藏的北、西、南界说法较为一致,唯独对东界说法有出入。王氏与秦氏认为西藏东接四川,华氏与陈氏认为是东接川边和西康,特别是陈氏直接说明西藏东界西康,显然认为康区已经不属于西藏。王氏与秦氏的说法反映了当时西康尚未正式建省,在行政地位上没有青海那么明确突出的情况。

(2)西藏的境域

对西藏境域组成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反映民国学人对“西藏”概念的理解。

①王氏的观点

王氏本人是地理学家,在其书中,三处提到西藏的范围。第一处如上引,在民国时“西藏”主要指卫藏(“东接川边”),并于其后论证说:

……故以历史的关系而论,川边无论如何,不应划归西藏,可无俟言。^⑤

第二处:

初,土伯特分四部,东部曰康曰青海,西部曰卫曰藏。^⑥

此处应该指明代及其以前的情况。第三处:

西藏旧分四部,曰卫,曰藏,曰阿里,曰喀木。^⑦

作者此处的说法参考的是清末刻印的《皇朝藩属舆地全书·西藏源流考》,实际与《大清一统志》的说法完全一样,指的是清代的情况。王氏书中给出的上述大中小三种关于西藏范围的界定很有代表性,是三种典型的说法。

②华氏的观点

华企云认为西藏实分为四部,即康、卫、藏、阿里。他反对将青海纳入西藏,特别指出:

青海居西藏之东北,在我地图上与西藏实为两地,但因英人久蓄图藏之野心故,在英国地图

上青海已包括于西藏之内,以为中英交涉西藏问题时可为拓地之谋也。^⑧

华氏在此已经将中西之间的“西藏”概念之争作了展示,并剖析了英人的目的。他将康归入西藏是为了对应他“西藏古为三危地”的观点,在后文又说“西藏东半部地,清季划为川边所辖,今则已建西康行省”,^⑨因此认为当时西康已不属于西藏。

① 王勤墉.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1.

② 华企云.西藏问题[M].上海:大东书局,1930.1~2.

③ 秦墨晒.西藏问题[M].南京:南京印刷公司铅印本,1931.1.

④ 陈健夫.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4.

⑤ 王勤墉.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91.

⑥ 王勤墉.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1.

⑦ 王勤墉.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43.

⑧ 华企云.西藏问题[M].上海:大东书局,1930.2.

⑨ 华企云.西藏问题[M].上海:大东书局,1930.3.

③秦氏的观点

秦氏认为,西藏全地原本可分三部,就是康、卫、藏,分别称前藏、中藏和后藏。①康在清代时已改土归流,民国建立后改为川边特别区,国民政府成立后改为西康行省。②在关于川藏交通的论述中,秦氏又明确说:

从打箭炉到巴塘西边的南墩向来归四川行省管辖,是西康境界……从南墩西上,经过察木多到察罗松多,原来是各土司辖境,清初归附,雍正年间赐给达赖喇嘛,本不是西藏的故土,是喀木故境……③

可见秦氏认为东部康区向来不归西藏,西部康区原本也不归西藏,只是后来赐给了达赖喇嘛。

④谢氏的观点

对西藏地域组成问题的重要性有深刻自觉并着力剖析的是谢与陈两位。谢氏花了大量篇幅进行考证并指出了汉藏之间关于西藏地域问题的分歧。他指出:

至于西藏领域,究以何处为止境?则中国人与西藏人,均各有其所指,且有非常之差异焉。④关于康与汉(内地)、藏的互相统属关系,谢氏认为:

至于西藏与内地分界何在?虽只有中国人以宁静山为川藏之界一说,然就西藏人与外国人,所谓丹达山为康藏分界一点观之,康实清代之固有领土,康之西界既止于丹达山,则康已非西藏版图,实为中国内地矣。惟是外人强词夺理,恒谓康为西藏之一部,即中国人,亦间有持此说者。故丹达山为康藏分界,西藏人,外国人虽有此说,但未承认康为中国内地也。⑤

谢氏通过自己的论证,认为康在清代就属于中国内地。

⑤陈氏的观点

西藏境内分三大区,前藏、后藏、阿里……普通一般人,尤其是侵略者,多以为现在的西藏包括西康、青海,这种错误是可怕的。西藏只是西藏,并没有包括西康、青海在内,我们一究其历史根源,自当明白的。⑥

接下来,陈氏对西藏境域的历史沿革作了细致出色的考证。他引证清代文献,证明西藏在古时确是唐古忒,有卫、藏、青海、喀木四部落,同时引藏文古文献⑦说明:

古时的西藏包有上三部(阿里),中四部(卫藏),下六部(西康,青海)。⑧

随即作者论证说:

所以这种史实我们不能否认,更不用这样,因为这种历史的沿革是一回平凡的事,古时的行政区域怎样能适应今日的中华民国呢?那能说今日的西藏仍旧包括青海,西康哩(同上)!⑨

陈氏通过引证文献指出,青海和西康在清代,主要是在雍正和宣统年间,已经分别脱离了对西藏的隶属关系。陈氏在书中作图表如下:

① 秦墨晒.西藏问题[M].南京:南京印刷公司铅印本,1931.1.秦氏此处应该是引清代魏源撰《圣武记·外藩》中的说法,指的是清代的情况。

② 秦墨晒.西藏问题[M].南京:南京印刷公司铅印本,1931.1.

③ 秦墨晒.西藏问题[M].南京:南京印刷公司铅印本,1931.6.

④ 谢彬.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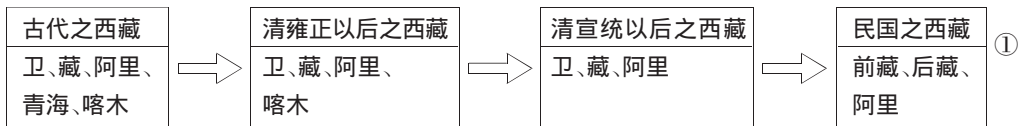
⑤ 谢彬.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7~8.

⑥ 陈健夫.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4.

⑦ 这是五本著作中唯一引用的藏文,且书中录入了藏文原文,但没有文献出处。

⑧ 陈健夫.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5.

⑨ 陈健夫.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5.



在上述五人中,陈氏的论证最为完备,关于西藏境域沿革的观点与今天的学者已经很接近。

民国时期正是从清帝国向现代中国急剧转变的时期。上述民国知识分子已经深刻感受到,中国正面临着来自西方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军事上的侵略,政治上的干涉,经济上的渗透,还有话语权上的垄断。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自觉地同西方争夺对“西藏”的定义权。五位作者从古今文献中寻找证据,一致认为“康”不属于西藏,没有一人将西藏与吐蕃的范围相等同。特别是陈健夫,从历史上的政治统属关系演变着眼来论证青海、西康不属于西藏,后来的中国学者也基本延续了这一思路。如马戎教授在其 1996 年出版的《西藏的人口与社会》一书中认为:

藏族与“西藏”是两个概念。从元朝直至今日,当我们谈到“西藏”的时候,指的大致是目前西藏自治区的地域范围,也就是传统的“卫藏地区”(前藏、后藏和阿里地区),即清朝时达赖噶厦政府在行政上管理、收税的区域。^②

海外新闻机构和学者则长期受达赖集团和流亡藏人宣传的影响,当他们谈论“西藏”(Tibet)时指的是达赖宣称的“大西藏”,即不仅包括目前的西藏自治区,还包括几乎青海全省、川西、甘南、云南西北等藏族居住区域(约 220 万平方公里)。^③

马戎教授非常清晰地指出了两种“西藏”概念的差异,在其研究中则用“藏族传统居住区”这一概念指代西方的“西藏”概念。

但争论不会停止,当代英国著名藏学家安德鲁·马丁·费舍尔(Andrew Martin Fischer)在其 2005 年出版的专著中,在解释 TAR(西藏自治区)时,仍然认为:

中国通常将西藏自治区说成是西藏(Tibet),尽管其仅占官方承认的中国藏族地区和藏族人口的不到一半。^④

在对其书中的“藏族地区”概念作注解时又说:

本书所说的“中国西部藏族地区”,或更通常说的“西藏”(Tibet),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定义的西藏(Ch. Zang)自治区和自称为 Bodpa(Tibetans)的人本土性定义的 Bod(Tibet)。^⑤

今后,中西之间两种“西藏”概念的争论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3. 康藏划界问题——对康的界定

即使关于西藏的地域组成观点一致,对西藏具体边界的界定又会产生分歧。五位作者大都主张以丹达山为康藏界,细究又各有不同。

(1) 谢氏观点

谢氏在书中批驳了以前流行的康藏以宁静山为界的说法,肯定了以丹达山为界一说。但其后谢氏又指出,在未设立川滇边务大臣以前,即使在宁静山以东属于内地的康区,对清廷也只是有朝贡的虚名而没有臣服之实,这都是中国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势力达不到的地方,势力所及仅是赴西藏的交通沿

① 陈健夫.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7.

② 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M].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25.

③ 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M].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51.

④ Fischer, Andrew Martin. 2005. *State Growth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ibet: Challenges of recent economic growth*. Copenhagen: NIAS Press. P. xiv.

⑤ Fischer, Andrew Martin. 2005. *State Growth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ibet: Challenges of recent economic growth*. Copenhagen: NIAS Press. P. xxii—xxiii.

李 健·民国时期的“西藏”概念 ——从 1926~1935 年间的五本《西藏问题》著作谈起

线。因此,如果非要说中藏的交界线是丹达山而不是宁静山,那么就与藏人主张的以打箭炉外的雅砻江或邛州为界一样,都是无意义之谈。既然西藏属于中国领土,就没有争执的必要,根据主权行使的方便来划就可以了。^①

(2)王氏观点

王勤堉也持丹达山为界一说:

西康疆域,东起打箭炉,西至丹达山,计三千余里,南与云南之维西中甸两厅接壤,北逾俄落色达野番,与甘肃交界,计四千余里。其西南过杂榆外,经野番境,即为英国属地。境域之广倍于川而等于藏。^②

(3)华氏观点

华企云认为康藏的交界处在丹达山:

西藏东半部地,清季划为川边所辖,今则已建西康行省。其疆域北接青海,东接四川,西连西藏,南界云南及印度之阿萨密。其西与卫相接,有丹达地,是为康卫交界点。往昔丹达山往东之居民,恒自称为康坝娃,其西之居民,则自称为藏坝娃,是其交界之明证。^③

华氏也提到了以宁静山为川藏界一事,但认为:

雍正三年间松潘镇总兵官周瑛勘定界址时忽以南墩宁静山岭为界,并建分界碑,规定岭东之巴塘理塘属四川,岭西属西藏,然康藏准确之界线固在丹达山也。^④

其后在考证西康疆域沿革时,华氏又引述前人文献,指出:

昔之康,乃今昌都(察木多)地方……至于今日所称之“康”,则实指逊清季世边务大臣所经营之川边而言,其地域则南接云南,北连青海,东起泸定,西迄丹达山。其间南北界已毫无纷议,惟西迄丹达,毗连西藏地方,则时起纠葛。^⑤

华氏意在说明“康”的范围也随时间在变化。此处批驳以宁静山为界一说时,华氏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质问:

宁静山以东已同内地,若其西地不属康而属藏,则将置康地于何处耶?^⑥

这一质问恰好反映了康在汉藏之间的尴尬地位。在内地与西藏关于康的论争中,康已被化为无形。表面上是关于边界的争论,背后则牵扯到复杂的话语争夺。最后,华氏又提出以江达为界的问题:

惟是宣统二年,边军征藏时,已直抵江达,故严格言之,今日康藏之界限,实以江达为鸿沟矣。^⑦

(4)秦氏观点

秦氏在书中认为,从打箭炉到南墩(宁静山附近)属西康境,从南墩到察罗松多(在丹达山西 50 里处)是喀木故境。^⑧可见秦氏认为的康藏界限也在丹达山一带,只是当时不在西康的控制下。

(5)陈氏观点

陈健夫对康藏划界问题论述较详,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不同于前述三人。首先,陈氏考证了康藏界限的历史沿革,指出:

康藏的界址,是民国以来康藏纠纷的一重要问题,盖自明末至清雍正初年以努卜公拉山为界,自雍正初年至清末是大都在宁静山以西,自清末至民国六年以江达为界,自后康藏迭起纠纷,至今

① 谢彬.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9~12.

② 王勤堉.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2.

③ 华企云.西藏问题[M].上海:大东书局,1930.3~5.

④ 华企云.西藏问题[M].上海:大东书局,1930.5.

⑤⑥ 华企云.西藏问题[M].上海:大东书局,1930.119.

⑦ 华企云.西藏问题[M].上海:大东书局,1930.120.

⑧ 秦墨晒.西藏问题[M].南京:南京印刷公司铅印本,1931.6.

尚未彻底解决。由现在实际情形谈,康藏双方是以金沙江为界的,因为两军隔江相峙之故!①
在后文,陈氏又列出一般对康藏界限的三种主张,即赵尔丰、尹昌衡及当时的蒙藏委员会的主张——以江达为界,傅嵩炂、九世班禅、驻藏长官蒋致余的主张——以丹达山为界,刘文辉的主张——如果中央对藏有确定把握的话,可以金沙江为界。宁静山一说已经不再被提及。接着,陈氏批评了关于康藏划界问题的“空谈”,剖析了实情:

著者以为,康藏界址在目前无法使它彻底解决,不能根据一固定的主张去实行,这是限于事实……所以康藏界址问题的解决,并不是空谈白论的文章所能济事的,我们要有一个适合实际的办法去进行。②

最后,陈氏提出了自己的划界方案:

“中央未恢复西藏统治权以前的康藏界址”……主张维持现状,以金沙江为界,但千万不可由中央政府明文订定以确定西康疆域,免得妨碍西康未来的省治,只能作为一种暂时的协定。③

“中央恢复西藏统治权以后的康藏界址”,主张以丹达山为康藏界址,无论由经济、政治、历史各方面言之,对于康藏双方都无妨碍,能使双方有机会同样的发展,这种理由并不深邃,试揭开康藏地图一看便会明白。所以我主张康藏应以丹达山为界。④

陈氏本着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来看待康藏界限,将国家力量看作解决问题的关键,力量达不到就只能维持现状,否则大发议论也只是空谈。事实上,后来历史发展的轨迹也确实印证了陈氏的观点,今天丹达山⑤一带仍是康区与卫藏的分界,而川藏的分界还是金沙江。

综上所述,在民国的时代背景下,上述学者的总体取向是逐渐将“康”从“西藏”的范畴中剥离出来,再将康藏的边界定在丹达山甚至江达一带。今天看,实际上在清末赵尔丰经营川边之前,所谓“康”主要是一个传统的人文地理概念,由川藏分治,“康”在国家行政意义上的边界范围并不凸显,此时正式的行政边界是川藏边界。从晚清时期绘制的地图中可以看到,川藏分界点多在宁静山以西一线。⑥在赵尔丰川边改土归流之后,特别是从1914年川边特别区成立后,“康”逐渐从历史、地理、语言、文化区域向行政区域转变,随之康藏边界也逐渐行政化。特别是此时期,一些熟悉和关心边情的国家精英与知识分子开始提出“西康建省”的思想,作为应对边疆危机、实现国家整合的一种策略。在此背景下,上述五位作者不约而同地通过挖掘利用传统资源来表述他们新的共同理想,即一方面彰显清末在康区的改土归流实践来为“康”的内地化提供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力图将传统人文地理意义上的康区行政化,最大限度地向西推进“内地”的边界。由此可以理解,为何作为传统康区与卫藏分界点的丹达山被转化为西康与西藏的交界点,为何上述民国知识分子一定要将“西藏”定义在丹达山以西。同样,在西藏一方,英国在西姆拉会议上提出“内外藏”的划分方案,其目的也在于向东推进“藏”的边界,希望有朝一日将康纳入彀中。⑦在近代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

① 陈健夫.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6.

② 陈健夫.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84~185.

③ 陈健夫.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85~187.

④ 陈健夫.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87.

⑤ 位于西藏昌都地区边坝县城西南不远处,又名夏贡拉山。

⑥ 参见(清)周士棠、孙海环.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新学会社藏版,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印行,第三十一图。

⑦ 20世纪20年代初,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一次对话正可说明这一点:“忽然,他转向我说:‘伦钦,为什么要西姆拉会议上把西藏分成内藏、外藏两个部分?’‘陛下,在我看来,事情是这样的。中国想给西藏靠近中国的部分安上中国名字,并把它们当作中国省份来对待。我们商定把它们叫做内藏,因而保住了它们的藏名。以后,如果你的军队强盛到足以维护西藏的主权时,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回贵国的这一部分领土。如果藏名丢了,就不好办了。’达赖喇嘛脸上一亮,说到:‘对,对,我懂了,我以前没想到这一点。’”见[英]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M].冯其友等合译.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196.

中,几乎每一步都面临着这样的内外上下的复杂博弈,一直到今天,这样的博弈实际上一刻也未曾停止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不断去构建一个真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中国,这也是上述五位民国知识分子没有说出的新的共同理想。

四、结语

西藏问题从产生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一百多年来,一代代学者志士都在苦苦研究和思索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然而直至今日,西藏问题仍然非常严峻地摆在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面前。今天,当我们再思考西藏问题时,仍然需要回到原点,从梳理基本概念着手。前人的研究与著述不仅仅为今人提供了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留下了当时著者的思考,为今天作关于西藏的文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从民国时期的五本著作来看,作者们对“西藏”名称的沿革及其内涵的理解都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当面临来自英帝国的话语挑战时,这些知识分子纷纷从古籍中寻找辩护的证据,以图确立对“西藏”概念的定义权,并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合法性论证。论证的结果就是:一,从名称上确立西藏与卫藏的对立关系,将安多和康视作与西藏并列的地域存在;二,从行政沿革上强调清雍正以后安多、东部康区、云南藏区归内地直接管辖的事实,借以证明它们不属于西藏;三,从传统人文地理角度将康藏分界的丹达山,或从改土归流的角度把赵尔丰曾到达的江达,作为西藏与西康的交界点,即西藏与内地(省份)的交界点。通过上述三点,已经可以看到民国知识分子在边疆面临危机的大背景下,除了向传统寻求话语资源之外,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参与现代民族国家边界的构建。诚如陈健夫所言:“一个国家假若是对于自己的领土不能施行统治权的话,那么她的领土的主权便要无形的消失,这是一回最危险的事。”^①陈氏已经看到,如果中国不从“天下”走向“民族国家”,将会面临怎样的危险。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理解“西藏”和思考西藏问题时,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目前仍然处于“民族—国家”的未完成状态,是继续推进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还是回归所谓的“跨体系社会”?^②我们似乎正处于一个面临抉择的十字路口上。对于这一宏大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将决定西藏问题未来的走向。

[收稿日期]2011-12-19

[作者简介]李健(1983~)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The Concept of “Tibe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search from the Five *Tibetan Question* Works Published during 1926–1935

Li Jian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five authors' understandings of the concept of “Tibet” from the Five Tibetan Question works published during 1926–1935 using the text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of all, these works all tried to establish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Tibet” and “Utsang”, and to exclude “Amdo” and “Kham” in the concept of “Tibet”. Secondly, they emphasized that Amdo and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Kham were already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Chinese provinces' governance since Yongzheng period, so the two places had not belonged to Tibet from then on. Thirdly, they regarded either Danda Mountain, the traditional boundary between Kham and Utsang, or Jiangda where Zhao Erfeng had arrived at as the demarcation point between Tibet and Xikang from the angle of traditional human geography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i-tu-gui-liu Action respectively.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ncept of “Tibet”; Tibetan district; the boundary between Tibet and Kham

① 陈健夫.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65.

② 参见汪晖.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A].见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47~204.